

这是一片只剩残枝败叶的荷塘。

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惊悚的场景,也未曾有过奇妙的遐想。在冬日的傍晚时分,在寂寥苍茫的水面上,它们好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殊死的战斗,还来不及打扫战场。它们的躯干犹如一大片交错着的长矛短剑,在彼此的空隙间折射着夕阳的余辉。它们当中有残断的、横斜的、卧倒的,也有沉入水中的,但更多的是傲然挺立的,而且一丛丛一列列一片片,就像随时会重整旗鼓举起刀枪的勇士,号令一响,便可迅速集结发起新一轮的冲锋!

之前的七八月里,是它们生命最美的季节。那些日子,它们就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和无穷的引力令人向往和颂扬,并被视之为圣物而顶礼膜拜。它们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风格和禅意般的纯美,已不单是一种美的化身和佛的象征,而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一种文化符号和高洁的精神。可我惭愧的是这种文化和精神,曾一度不是那么十分通透清澈。因为,以往我每次去松江醉白池或新浜,或是无锡或杭州观赏它们,都是它们最艳丽的花季,纯粹是为了视觉上的享受,也从未打算在花落叶败时去亲近它

残荷大美

刘向东

们,更没能去作些深层次的联想和感悟。

直到初冬的某一天,同样是我熟悉的那片荷塘。可它们却不再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浩浩壮丽和“一一风荷举”的绰约风姿。它们那副“一夜绿荷霜剪破”的枯荒衰败和萧瑟苍凉也确实令我凄婉。然而,我凝神观瞻很快就感受到了它们有种种别样的大美,也隐约看到了它们的筋骨中仿佛都蛰伏着一股蓄势待发的力量。它们那种似乎奋力挣扎或凝固着的造型也都隐含着残而不死,败而不灭的枯荒之美和奇崛之势。那种凋零的舒卷、静穆的凛烈、枯涸的古拙、瘦骨的遒劲和苍莽的朗润,都会让人不得不有种脱离凡尘的思考而油然感受到生命的每一阶段其实都有着非凡的精彩和大美。

由此,我又想起前不久在赴朴初先生的家乡安徽安庆参观“禅源太湖”书画展的见闻。其中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文博园萧子陶艺馆著名画家张云华女士的

残荷作品最惹人注目。当现场一记者问及为何对残荷情有独钟时,她坦然回答说:“残缺也是美,如同断臂维纳斯一样。只有残缺才会有向往和追求,这便是残缺之大美和珍贵。”而面对一幅幅大写的残荷作品,我想张女士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创作残荷作品,并非是刻意地以残荷为题材来独辟蹊径,而是以老子“大巧若拙,大成若缺”的哲学思想和真实活泼形神相融的水墨去显现心灵的境界和诠释残荷的大美,从而唤起人们对顺应自然之美的渴望和追求。她的残荷作品形似枯萎衰朽、枝叶斑驳、经脉粗拙、布局简约,但墨韵酣畅雄浑飘逸,无不洋溢着“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浓”的美学思想和高远的自然灵韵。只要稍加留意,不仅能清晰地透视到枯萎中的活力、斑驳中的通达、粗拙中的朴实和残缺中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能从中领悟到生命轮回的真正意义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哲学意境。

夕阳沉下,残荷静寂。这种静寂不是生命的落幕,不是惆怅,也不是等待,而是风霜雨雪的磨砺,和新生生命的孕育与力量的凝聚。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以百倍的力量和崭新的风貌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风采!

不曾远去的松花新村

刘翔

松花新村是一个位于上海市东北角、建造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工人新村。被命名为松花新村也许是紧挨着松花江路、延吉东路的缘故。新村附近的路名大都取自东北地名,如和松花江路平行的有靖宇路、延吉路,纵向的则有敦化路、内江路、图门路、安图路、长白路等,无不让人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东北风味。

整个松花新村按东西划分为一村和二村,我们一般就称之东松花、西松花,共有数十幢尖顶、灰色的三层楼。那时居住在松花新村内的基本上都是上海机床厂的职工,而上海机床厂就处在与松花江路交叉的军工路上。因此,松花新村实际就是该厂的家属区。而紧挨在旁的是上海电缆厂,该厂的职工新村、职工子弟小学则位于松花江路、延吉东路右侧。当时两厂都是上海市、乃至全国名声显赫的万人大厂。因而,以这两个厂为主体构建成了上海东北角的工人家庭聚集区。

当年,夫妻俩到厂里上班,和我們到学校里都要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以了。每天清晨上班、上学和黄昏时下班、放学的人流夹杂在滚滚的自行车潮中,给那时还是上海这座城市偏僻市郊小道的松花江路增添了几分喧闹的都市氛围。我的出生地是松花一村7号14室,面积16平方米,两户合用厨卫的一室户。这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父母结婚时,机床厂分配的婚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工人阶级绝对“高大上”,因此,能够无偿分配到这样一间房间,用现在的眼光来打量,足以让如今的年轻人羡慕的了。

上世纪50年代是“听话要听党的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的纯真年代。我出生后不久,正当盛年的父母,便将祖父请到上海,把我“扔”给了祖父带养。这样一来,原本只是父母两人居住的16平方米的房间,一下子多出了我与祖父,三代同堂,空间顿时就变得狭小起来。

父亲便和邻居商量,晚上能否在厨房搭个帆布床让祖父睡觉。邻居是父亲机床厂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时的人就是单纯,信奉助人为乐,得知我们家的困难后,他当即就同意了。

于是,每天晚上两家人家吃晚饭,将炊具洗净,邻居一般也就不再出入厨房。而祖父把我安顿入睡后,便将煤球炉封好,再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帆布床在厨房里铺好,随后在床边坐下。烟瘾极大的他,这时将身子舒适地依上墙壁,掏出一根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放松”起来。随着袅袅烟雾的飘浮,一天做家务的劳累也就渐渐飘远了。

偶尔,祖父独自在帆布床边支起一个凳子,斟一杯土烧酒,打开用白报纸包裹成的三角包,里面装着5分钱的油余豆瓣。祖父给豆瓣撒一点细盐,便沉醉在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此时此刻的祖父,是一天中最为幸福的。然后,便一头扑倒在帆布床上酣然入梦,睡得无比香甜。他发出的呼噜声,有时会“穿墙”而过,传入我的耳中。

不过,一到清晨5时,他便又准时起床,打开封好的煤球炉,煮烧早饭。祖父那浓眉大眼、腰背挺直,始终忙碌家务的身影,至今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其实,当时祖父睡在厨房内,是在和死神相伴啊!因为一旦煤球炉子没有封好,发生一氧化碳泄漏,就会导致中毒。

我懂事起,便为祖父跑腿,到松花新

村菜场边上的粮油店买酒、买香烟。这时候,祖父常常会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派头,颐指气使地把一毛钱纸币朝我一扔,大手一挥:“小鬼,快去帮爷爷买点老酒,买包香烟!”而我也经常从找回的零钱中“贪污”一两分钱,作为自己的零用钱。殊不知,这一两分钱在那个年代绝对能派大用场的。祖父没有工作,其烟酒钱也是父母给他的,他明知我“贪污”,却装着“浑然不知”。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不仅烟瘾、酒瘾很大,古诗词的底子亦很深,酒至情深,能把李白的一首《将敬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吟诵得慷慨激昂。

与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不同,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发现松花新村大人们开始显得心事重重起来。原来,这时国家发布了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的“三线”政策,简称为“支内”,上海机床厂对口支内单位是陕西省的汉中机床厂与宝鸡机床厂。组织上一旦定下哪个职工去“支内”,那就是连“根”一起拔,其本人和全家都必须把上海户口一同迁入陕西。我的好多小学同学随同父母一起挥泪告别上海的故土,远赴汉中或宝鸡,一呆就是十年。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住在我家楼上的一名姓李的小学同学,他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其父亲和我父亲在一个车间工作,是第一批被指令去汉中机床厂支内的。他们举家迁往汉中,告别上海的那一天,这名同学在父母的带领下来我家道别。他拄着拐杖的身影和茫然的眼神,如今想来,依然令我难以释怀。虽然后来大部分支内职工退休后,陆续回到了上海,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职工则把“根”永远扎在了陕西的黄土地上。今年3月,我去汉中参加一个文化活动结束后,在安家在汉中的小学同学季兄的陪伴下,专程去了汉中机床厂。在同那些说着流利上海话的“汉中老人”叙聊时,想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离别上海,将青春与热血永远贡献给了这片黄土地,不禁感慨万分。

我们家在松花新村一直居住到我小学毕业,以后随着弟妹的陆续出生,我家也就成了住房困难户。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机床厂将我住房分配到面积更大的长白新村后,我便搬离了松花新村。

回想起来,居住在松花新村的那些年,是我们国家,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尽管那是一个各类生活资源短缺、家庭经济不富裕的年代,但老百姓的心灵却十分单纯。而今,一晃50多年过去,我们家也演变成了由祖孙三代十一口人的四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

近几年过春节,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除夕年夜饭,都是在松花江路靠近松花新村的一个饭馆吃的。当除夕夜的钟声敲响后,我悄悄地溜出饭馆,漫步在寂静的松花江路上,凝望着夜幕下的松花新村。松花新村和松花江路已经物是人非,原先的三层楼尖顶房,已经加层为四层楼的平顶房,四周也砌起围墙作了封闭式管理。和周围一幢幢耸立的商品房小区相比,松花新村真的是显得“老态龙钟”了。

可是——新村老了,路灯亮着;街巷睡了,时间醒着。今天,回望松花新村的往昔,亦是我的一种乡愁与诉说。

浪花与海

——《我和我的祖国》观后

蒋近朱

门城楼的伟人,而是把镜头对准幕后英雄:为保障开国大典国旗顺利升起,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争分夺秒排除万难,用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确保开国大典“万无一失”。此单元情节紧凑环环相扣,全程牢牢抓住观众心。当林治远克服恐高爬上旗杆顶端解决升旗关键难题那一刻,观众的心也悬在了半空;当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顺利升起高高飘扬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了高潮……黄渤演活了林治远,除了无可挑剔的演技,那一口方言也使人物更接地气。相比之下,到了讲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故事的《回归》单元,饰演仪仗队队长的高亚麟也口吐方言,就未免有点东施效颦了——时光过去近半个世纪,普通话还不够普及?特别是肩负接管香港重任的官兵,代表的可是国家形象。还有“发个媳妇”之类硬装噱头的俏皮话,更显得不合时宜也不符人物身份。瑕不掩瑜,《回归》整个故事的构思严丝合缝,杜江、惠英红等两地演员也配合默契表演到位,成功在银幕上再现了“回归”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张一白执导的《相遇》,讲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故事,表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忠诚与隐忍,为了国家机密,甘愿隐姓埋名,对最亲近的人也守口如瓶,哪怕被深深误解。张译饰演的科研工作者高远,为献身国防

科技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演员的表演可圈可点:公交车上“相遇”那段,面对女友的不理解怨质问,戴着口罩遮住大半个脸的张译沉默不语,却“无声胜有声”,仅靠眼睛演戏也完全征服观众,让人为之动容。

镜头对准普通人,表现每一朵浪花与大海的关系,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各单元的共性。只是总导演陈凯歌亲自挂帅的《白昼流星》,把2016年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的重要时刻作为故事结尾处背景,大量镜头都给了两个离家出走的流浪少年,不免让人感觉喧宾夺主。但愿导演不是出于私心,为让小儿子陈飞宇担纲主演才如此安排。导演解释是为了表现“扶贫”,特别是想突出“精神扶贫”。而在观众看来,总感觉两部分内容连接牵强。当然,白璧微瑕,并不影响《我和我的祖国》整部影片对观众的心灵冲击。

每个普通人的命运,都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将普通人推到历史舞台最前景,定格每一朵浪花的闪耀,绘就大海的波澜壮阔,对新中国历史和创造历史的新中国人民,是一次深情的致敬与回眸。



腾霄折桂媚无边

董永年 摄

風亭華

俞景芝 书

安放欲望,养眼舒脾的地方。
协调情绪,无悔岁月的地方。

想你,举十知九,十鹿九回头,十里长街上都是你。

想你,在夜的堤坝,一条船装满了最美的邂逅和认同。

想你,把你当成泊的绝渡逢舟,渡河香象。

想你,把你比成聚的愉悦、先苦后甜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只要有一杯水,一条桨的广富林就能撑起一根篙的水波涟漪。

只要一杯水里泡着有你,一片叶的落地窗就会降着一帘印月目光。

在你的浅岸,心静下来,喂一口漾在水面的月光。

就能够听见一曲沉鱼落雁和鱼水相欢的楚舞吴歌。

雨水疲惫的下午。一壶普洱端出一份紫砂暖照。

一杯龙井拱起一程汤色绿染,不空不昧和为你而浮。

在黑渡口,想你

王迎高

在黑渡口,茶是涛声,是酒是诗,是艺是画,是思源和修身养性。
是洵的互让,赏的相敬,闻的陶冶,饮的礼仪,品的天下茶人是一家。

指尖滑过琴弦。
一串串音符在杯中歌舞升平与谈笑自若间。

在你的杯中,那一只只看世界的眼,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多好,一张桌子摆着你欲罢不能的唇红和珠翠。

一只杯盏绽放着你恰到沸点的隐约烟火和水墨知乎。

只想多呆一会,在黑的暗亮处脱去灵魂的衣服。

在黑的流水处抱紧你内心的饱盐和舌尖上的涩痒。

一撮星辰可以泡出一瓯书法韵,一壶良茗著。

一勺人品可以滋味一罐宁静温和,一碗谦逊与冲淡闲适。

一杯站起来的水,有九峰的关节,沂河的腰身和知也禅寺的钟声。

一杯弓着背的水,肩上挑着护珠宝光塔的云朵和“登览者极江海之观”。

这真的是一杯陪伴、惦记、奔跑中的心率和睡不着的口渴。

是一杯彼此间的信任,醇厚,思悟,做人的温度与有你正好。

是一块良田,一处皇甫林的晓雾晨曦和“斜月未堕山,烟中市声起”。

更是一个向善走的台阶,慢慢长大的认识自己以及知足胃口的热播剧。

喜欢黑,因为你名字里有一个黑在点睛。

因为黑的肺腑里呼吸的是在乎、同床共枕和放下空杯。

因为黑的渡口在我们之间美得让心嘞瑟,让情地老天荒。

手机

可然

上世纪80年末,我和同事们去北京旅游,同学陈先生在北京工作,他结交的朋友有路道,这一次是带我们去看观中南海。回招待所的路上,他手里一块像砖头一样的黑色玩意,问他这是什么?

“这叫大哥大,是美国进口的。可以和全世界的电话通话,不过电话费蛮贵的,一分钟4角。”出于好奇,我拿过来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果然通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的手机。我感到,小时候看《科学家谈21世纪》,书中描述的手持移动电话提前实现了。我很羡慕,心里想:啥时候我也买只大哥大!

回到上海的不久,上海电话局开始登记预售“大哥大”,我迫不及待地拿了身份证去登记购买,两万元人民币一只,电话局声明:大哥大啥款式,啥品牌目前不知,届时以提货为准。两个月后,接到电话通知,可以去取“大哥大”了。拿到的手机是NEC品牌的,比当时流行的摩托罗拉“大哥大”体积小一半,配有一个皮套。有人说这小巧玲珑,也有人说这气派不大。反正各说各的,认识不同,功能一样,可以通电话。

买到了手机,心里确实很高兴,裤腰带